

复刊当年话艰辛

■管陶

弹指一挥间,《瑞安日报》复刊已30个年头了,作为瑞报最早的报人之一,真是感慨万千。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瑞报复刊初期的艰辛、报社同仁团结拼搏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1993年6月下旬,时任市委书记包哲东对我说,市委决定办《瑞安报》,让你去办报。我一听,心中很矛盾。说实在的,我喜欢新闻工作,但我当时在市委办搞新闻信息工作,得心应手,工作“很自由”。而且老报人经常戏说“办报难,难办报”,《瑞安报》应该怎么办?毕竟接受党的教育多年,组织上决定了的事情,我服从。在忐忑不安中,与另外两位总编和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六七位年轻人一道,开始了办报之旅。

办报伊始,困难真不少。暂不说7年搬了5处地方,年年为“房”而烦,就采编来说,采写、编辑、照排这些工序统统都要从头学起。采编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正式新闻科班出身,不过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很快就成了报社的中坚力量。编辑们说,我们一靠模仿人家报纸,二靠自己摸索。记者写的文章改了又改,编辑画版样,画了又画,甚至交印刷厂制版了,深夜11点还“集体”去印刷厂再改。我这个当“头头”的,天天唱“五步曲”:上午一上班派工开始,催稿、审稿、统筹版面,一直到晚上,在清样上签上“付印”两个字,才如释重负。

岁月如歌。那时,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很纯朴,一门心思办好报纸。我很省心,记者们不会因为采访困难重重而推诿,编辑们默默无闻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当时采编人员还没有人人一台电脑,写稿改稿全是名副其实地“爬格子”,埋头苦干。大家常为策划一个好报道争论,为取一个贴切的标题苦思冥想,为一篇成功的报道雀跃欢呼。至今还忘不了许多“特殊时期”——1994年17号台风登陆后的惨景,泪洒版面;为精准报道1999年“2·24空难”,多人连夜反复修改、换版,后来,那次报道作为新闻敏感性与严守宣传纪律的典型入选中国新闻论文集;2000年洋农民阿维热意大利寻亲的报道,开启了全省县市报境外采访

之先,被中央电视台数十次播放。还有水稻专家朱伯衡、山区校长王步宙、花菜大王郑庆一……这些先进人物报道至今令很多人记忆犹新。除时政版面外,瑞报也逐步形成多个有特色的版面或栏目,比如副刊“玉海楼”“读者广场”“理论专刊”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当时的传播手段有限,报纸既是向全市干群开展宣传的重要工具,也是市领导获取全市各地信息的重要途径。他们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瑞安报》,亲切称之为“早餐”。于是,我安排投递员一早就把当日的《瑞安报》塞进市领导办公室的门缝里,以便他们上班第一时间了解本市新闻,并更加关心支持报社工作。后来每逢周一上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总让我到他办公室,当面交待本周工作的宣传事项,使报纸的宣传更具前瞻性和全面性。用他们的话来说“瑞安报的宣传很放心”。

长时间以来,遵照党的群众路线宗旨,我们十分重视通联工作,组织和培育了一批骨干通讯员。据统计,2000年以前,瑞报刊出的稿件中有近一半来自基层通讯员之手。每年我们都召开通联会议,表彰先进、培训骨干,多次开展采风、讲座活动,提高骨干通讯员的思想和业务水平。这些通讯员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加上报社的引导和锻炼,进步很快,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成为单位骨干。而后成立的《瑞安日报》学生记者团更成了中小学生的新苗乐园。

与此同时,报社的一些专版、专刊,例如“读者广场”版面,也成了与群众沟通的渠道,遇到疑惑,找报社,成了他们的首选。

副刊“玉海楼”更成了我市文史和文学爱好者喜爱的园地。

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报社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在办好报纸的同时,为社会输送了不少人才。九十年代进报社的记者、编辑,多人后来成长为乡镇或市领导干部。他们说,在报社的那段工作经历,是最锻炼人的。报社人才济济,在各个协会中担任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就有十人之多,他们为瑞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瑞报越办越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省记协县(市)党报各类评比、竞赛中,获奖篇次均居前列。而本人也成为当时全省县市级报总编中获奖最多的人之一,在1997年市级机关开展的争做“干净干事”好干部活动中被树为宣传系统典型,先后获得瑞安市新闻工作突出贡献奖、瑞安市文艺工作突出贡献奖。

我在报社一直干到退休。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是过去的市里老领导、老同事,还是新生代的企业家,至今碰到我,还亲切地唤我“管老师”,这既是对报社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在庆祝《瑞安日报》复刊30周年之际,我这个老报人衷心祝愿《瑞安日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扫一扫

看图文

回望副刊“玉海楼” 留下真情从头说

■马邦城

时光匆匆,蓦然回首,本人退休离开报社已有13个年头了,然而我与《瑞安日报》的那段情缘,一直梦牵魂绕,挥之不去。

我是最早加入《瑞安报》的老兵。办报之初,报社编辑部就设在仓前街老干部局一楼。当时,仅5名采编人员,由朱友好编一版(要闻),我编二版(经济),王海燕编三版(社会),华小波编四版(文化),施巨耀一人担任记者。版面实行包干制,自采自编,自行组版。说来惭愧,我们5人当中,没一个是正儿八经的报人出身,都是门外汉,只能在干中学、学中干,无师自通,靠着石头过河。尽管举步维艰,却也有苦有乐,个中的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最难忘、也最欣慰的,是在副刊部主编“玉海楼”的那段日子。1998年元旦,报纸扩版后,我被调到副刊部,与池凌云、王海燕、华小波3人共事。当时,刚刚组建的副刊部,可谓“兵强马壮”,除朱友好外,原先报社的3位“首任”编辑,全都凑到了一块。池凌云颇有诗人风范,我曾戏言“这里池浅,你迟早要凌云的!”她大笑。后来她调到温州去了,果然被我言中。

其时,副刊每周一、三、四、五出专版,内容涵盖文史、生活、社会、文化4大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副刊”。我接手的“玉海楼”,原先一直由华小波主编,是当时《瑞安报》的“拳头产品”。虽然我的介入,颇有点“横刀夺爱”的味道,但小波丝毫不存芥蒂,这使我更感到一种责任与压力。尤其是陈思义调任报社总编后,对副刊似有一种特殊的“偏爱”,经常光顾指导,这对我来说,既是动力又是压力。他要求编辑加强精品意识,要让副刊体现“时代、时机、时令、时髦”四大特色。他还建议从“玉海楼”中分离出纯文学这一块——“梅雨潭”来,使这个名栏目由“单拳”变为“双拳”。1999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报社还与市文联一起,在瓯海西雁举办“青年作者座谈会”,进一步壮大了副刊的通联队伍。

对副刊的关爱,更多的则来自热心的读者与通讯员,赵三祝、俞海、李淳、张益和章毓光诸位老师,从《瑞安报》复刊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与副刊携手同行。记得“梅雨潭”栏目刚分出的那阵子,文史类的稿件匮乏,我忙向地方史权威、《瑞安市志》总编宋维远先生求援,他很快就寄过来5篇文章,那可称得上是5颗“定心丸”啊!还有陈之川老先生,接到电话后,顶着炎炎烈日,亲自来到报社给“玉海楼”送来两篇稿件。面对这些热心的读者、作者,总觉得有一种责任重压在心,催我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人生的一种幸福。我原本想在副刊部

伴着“玉海楼”,一直干到退休的。记得当时还曾与陈思义总编合计过,要将“玉海楼”中刊登过的精粹文章,挑选出来编书出版,陈总对此也深表赞同。可事隔不久,我被调到了新闻部。虽然心里很不愿意,但还是拗不过组织决定。再到后来,陈总自己也退休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退休后的头一年,便又与编书这件事扯上关系。原来报社领导正在筹划,要出版“玉海楼”人物专集——《玉海名家》,并打算把编辑的任务交给我。遇上这等好事,本人自然要竭力玉成,而且无论从个人情感,还是专业角度来说,我都很乐意去当这个“责编”。经过报社上下近一年时间的努力,洋洋50余万字的《玉海名家》终于面世了。全书共刊载70多位作者、260多篇文章,这对瑞安地方来说,是很有存史价值的。编辑此书,我本人也从中获益匪浅,通过认真编校,等于将众多的瑞安历史名人,统统给捋了一遍,使我对先贤乡哲的生平事迹更加熟识了。

编书期间,刚好遇上瑞安市社科联为宣传普及瑞安乡贤文化,正与报社协办。王海燕特地为我在副刊“玉海楼”上开设了“瑞安先贤故事会”专栏,要求每周为其撰写一篇瑞安历史人物故事。虽然压力很大,我仍欣然应命。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总共撰写刊发了60篇乡贤故事。不久,《温州晚报》副刊主编池凌云也约我在“东瓯人文”上撰写“名公贤才”系列故事,更是将我“逼”上了梁山。其时,我又写文章、又编书,似乎在透支体力与健康。由于过度劳累,结果造成心血管堵塞,被送进了医院。此后,我不敢再“玩命”,只好把编辑“玉海楼”第二部精粹选编《罗阳遗事》给推掉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一如既往在“玉海楼”撰稿。嗣后,管舒勤和谢瑶两位编辑曾为我在“玉海楼”开设过“我说支边那些事”“瑞安英烈故事会”等专栏。尤其是“瑞安英烈故事会”专栏,是为迎接建党100周年而开设的。从2020年4月开始,至2021年12月结束,总共刊登28篇、计10多万字介绍先烈的长篇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宣传效应,并在2021年度中国县市区域报新闻奖评选中获奖。

总之,是“玉海楼”成全了我晚年的“创作梦”,使得我在乡土历史人物资料与素材方面,拥有了深厚的积累,并且在此基础上,连续编写出版了《瑞安古代清官故事》《瑞安历史名人列传》和《风流满东瓯——永嘉学派人物故事》3本书。在《瑞安日报》复刊30周年之际,谨将此文献上,以表我的感恩之心。

三十风华 三十而励



张金国/书



扫一扫

周年征文活动

看瑞报复刊



扫一扫

看图文